

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震撼着世界，李大钊首先热情歌颂“这新纪元的创造”，他在1918年《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引起了反响，而最早真实而又具体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实况的是瞿秋白。1920年10月16日，他作为《晨报》的特约记者离开北京，奔赴俄国考察写作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饿乡纪程》记录了他自中国到俄国一路上的见闻经过、具体事实，以及内心的变化起伏、思想建设。《赤都心史》记录了瞿秋白到莫斯科之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这两部著作，记录了一个“东方稚儿”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思想发展历程。

深厚的文化底蕴

瞿秋白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瞿氏“祖孙、父子、叔侄，世代科名”，“无瞿不开榜”，“相继为士大夫者十余世矣，诗书之泽如此绵远，亦人家所难能而不可必得者也”。瞿秋白自幼便受到正统的古典文学的教育，家庭给予他很深厚的影响，书香的氛围也塑造了他上下求索的勇气。父亲瞿世玮擅长绘画、剑术、医道，生性淡泊，不治家业，寄居叔父家中，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知县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济。他的母亲对旧学也颇有根底，所以瞿秋白自然而然地有着较为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在文字上也是才子卓然。

不仅对文学充满兴趣，瞿秋白涉猎十分广泛。羊牧之在《霜痕小集》里写道：“(秋白)在中学时除钻研正课外，已开始读《太平天国野史》《通鉴纪事本末》、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群学肆言》、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枕头边经常乱堆着《杜诗镜铨》《词综》等。……他读书很多，有一次到我家家来，吃饭时对我说：‘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李子宽在《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一文中回忆道：“惟《庄子》除秋白外，他人皆不易无师自通，亦惟秋白能独立思考。”瞿秋白读的书广而博，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既有儒家思想，同样有道家老庄思想，此外瞿秋白也看佛学，思想体系也会有佛学的影响。

虽然出身于名门贵族，但是辛亥革命后，伯父瞿世琥弃官闲居杭州，停止对瞿世玮一家资助。瞿秋白家陷入经济困境，搬到城西庙沿沿汪瞿氏宗祠居住，靠典当、借债度日。瞿秋白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瞿秋白在《多余的的话》中写道：“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这一点，与‘奉儒守官’的杜甫是极其相似的。”

1916年2月瞿秋白的母亲因贫自尽，一家零散，父亲只能以教书维持生计，家人各自投奔亲友，这引起了瞿秋白对于社会人生关系的痛苦思索，他后来执教于无锡江波国民学校。于1916年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与柔石、殷夫等四名作家被杀害于上海龙华，史称“左联五烈士”。《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后简称《光明》)是胡也频就义前创作的最后一篇长篇小说，也是他生平创作中最长的一篇。胡也频的经历，在其时左联成员中，是相当特别的一个。

胡也频，1903年生，原名胡培基，胡崇轩，福建福州人。幼时曾入私塾、教会学校，皆未卒業。因家中贫困，15岁往台江祥慎金银铺做学徒，1920年，以不堪店主折辱故，逃亡至上海。后往大沽口海军学校学习轮机，未几仍失学，遂于1923年抵北京，开始了作为“漂泊者”和“文学青年”的双重生活。

在1923年的北京，这两种身份常常是重合的。相比于1917—1919年间即置身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现场的那些先辈来说，以胡也频为代表的青年有着显著不同的际遇。姑且不论罗家伦、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领袖，即使是纯粹以诗文名世的俞平伯、凌叔华等人，也大多出身望族，在北京的公立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相反，1921年之后拥入北京的人们，往往带着“小镇青年”的印记，如胡也频一般，他们来自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没有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社会经历复杂。

在北京，由于缺乏圈子的支持，也没有家族方面稳定的经济来源，作为自由撰稿人，他们必须完成相当数量的写作，才有机会以其中的一部分换取稿费，支付基本的生活开销；频繁辗转于公寓和当铺间，困苦的生活反映在创作上，这批文学青年的作品多弥漫着强烈的颓废气息。

尽管在事实上文学创作常常以糊口为首要目的，不过，这些文学青年同时仍然将“文学”当作将自己从现实中超拔而出的某种崇高事业。在类似的境遇下，胡也频先后结识了丁玲、沈从文、刘梦苇等作家，到1927年时，胡在北京文坛已经成为了小有名气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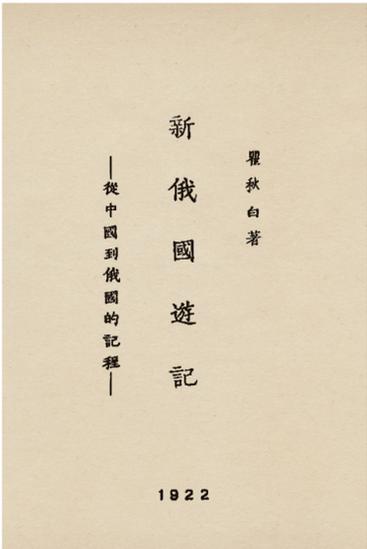
然而，到1927年，由于国民革命的进展，北京的文学刊物“或者已迁上海，或者已停刊，作者不是向南方走去，就是疲弱无力，不能提笔”。后来丁玲和沈从文都回忆，当时身在武汉的许多友人都曾来游说过，但胡也频并没有起过南下参加革命之意。直到1928年2月，胡、丁一道前往上海，主要的目的还是想重拾上海集结的新事业。此后在沪杭的一年间，胡也频主要的发表圈子，依旧是北京时期结纳的商务派和新月派，从内容上也看不出太多变化：小说多是恋爱小说与乡土小说，诗则是李金发体。

但此时在上海活跃着的，却是一批全然不同的人。

从1927年开始，在上海，自日本归国的创造社后期成员、以党员身份而从事文学事业的太阳社成员，正在和此前活动于北京的五四作家论战，要求清算文学革命以来的整个新文坛，推动全新

奔赴饿乡 探索道路

——《饿乡纪程》的创作 □贺同越



新俄國遊記
——從中國到俄國的記程——
瞿秋白著
1922

12月到了武昌投奔堂兄瞿纯白。

赴俄前的思想准备

1917年春，瞿秋白入京，原本要报考北京大学，但因付不起学费，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未被录取。后考入外交部“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俄文专修馆的教材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科夫等俄国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瞿秋白继而对俄罗斯的历史、文学、哲学等产生了深厚的兴趣，这对他的最初政治思想和文艺观念产生了影响，此外还扩大了他的视野，让他了解到俄国当时的情况，对他奔赴俄国的采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俄文专修馆读书期间，瞿秋白在《新中国》第1卷第5号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译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他和朋友们开始了对俄国文学的翻译。1919年11月，他和一些朋友创办《新社会》旬刊，他是这个旬刊的主要编者及撰稿者之一。创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在发刊词中写道：“现在创刊这个小小的报——《新社会》的意思就是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他在《革新的时机到了》一文中，更是大声疾呼：“革新的时机到了！中国人若是能趁着这个时机，极力奋斗一下，非但中

国自身有无穷的希望，就是对于世界也有极大的贡献。”他在《新社会》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是研究和宣传劳动问题、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他揭露旧社会的种种罪恶，主张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他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就做了一番研究，并且相当赞同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改造中国社会了。他把当时在中国流行的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研究比较了一番之后，说：“我以为历史派的——马克思主义派直接运动(是)不可少的。……我想这是比较普遍的、较易进步的方法，不至于像办新村办不好，仅仅是新式理想的桃源。”(《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但是这个刊物在1920年5月就遭到禁止了。原本的刊物被禁止之后，瞿秋白又和《新社会》的同仁合作办了一份《人道》月刊，但是由于成员之间思想的分歧，这个刊物只办了一期就停刊了。

1920年5月，瞿秋白任俄专学生会代表，做了“政治领袖”，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政治运动。郑振铎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二三事》中写道，“我们这一群代表着‘俄专’‘汇文’和‘铁路管理’的便在一起，成了一个单位，主要的原因是平时见面多，比较熟悉，因之，在开会、活动时也就常常在一起了。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的天才……”在京城形势严峻的时刻，瞿秋白、郑振铎等始终坚持斗争，毫无畏惧，机警应对当局的迫害。“秋白是很机警的，曾经被一个走狗跟踪了半天，跟上了电车，又跟上了人力车，但他转弯抹角的兜圈子，终于甩掉了那个狗子。自此之后，秋白的行动显得更小心了。”(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二三事》)为着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的兴趣，瞿秋白加入了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主义说研究会，思想倾向更明显地靠近马克思主义了。同年，他应北京《晨报》之聘启程赴俄任通讯员。

为何取名《饿乡纪程》?

根据瞿秋白自撰的《饿乡纪程·附记》说明：“篇中所写，原为著者思想之经过，具体而论，是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俄’之心程。因工作条件的困难，所以到1921年10月方才脱稿，此中凡路程中的见闻经过，具体事实，以及心中的变迁起伏，思想理论，都总叙总束于此(以体裁而论为随感录)。”

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的俄国并非是一片和平

“光明”如何来到我们前面

□付丹宁

构成了控诉的理论依据，无论这种激愤是来自对下层民众的代言(《海岸边》《船上》)，还是带自叙述性质地指向其时的出版商(《往何处去》《一群朋友》)。

和这一时期的沈从文一样，高产而仍然带有习作性质的写作，往往使他们尝试过一切当时流行的小说题材，但这些新倾向在沈从文那里是几乎看不到的。倘使将沈从文的生命轨迹视为一个北京文学青年合逻辑的发展，那么1929年则是胡也频与这一逻辑诀别的时刻。

决定性的变化发生在1930年。在上一年的年底，仍然抱着以同人刊物维系文学事业理想的胡也频和沈从文再度遭遇了失败，两人合办的“红黑出版社”倒闭，并因此欠下了1000元的债务。月刊《红黑》停刊后，沈从文前往中国公学任教，不久胡也频则经人介绍在山东济南高等中学觅得了一个教职，大约在1930年的2月，胡启程北上。

丁玲稍晚于胡也频动身，但到济南后胡也频的状态使她颇为震惊，据说胡“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么多的同学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夜深还有人不能让他睡觉。他是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我看见那样年青的他，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而他却是那样的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

后来他参加到学校里的一些斗争……有些同学在老师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文学研究会，参加的有四五百人，已经不是文学的活动，简直是政治的活动……我记得那是五月四日，全学校都被轰动起来了。一群群学生到我们家里来。大家兴奋得无可形容。

这一时期济南的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央关于“红五月”的指示山东党委是以青岛为中心展开的。也就是说，胡也频是以相当随意的方式开始了他的革命文学家的生涯，又在完全自发的状态下组织起了一个庞大的革命青年队伍，连自己都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无论从丁玲或沈从文的表述看，胡也频这时的变化都是意料之外的，看上去，与其说是那些革命理论说服了胡也频，不如说是群体性的革命激情俘获了他。

正是在这一时期，胡也频开始了《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的创作，小说于1930年5月开始连载



的景象，当时多有亲朋好友劝瞿秋白不要去俄国，奔赴兵荒马乱、内外交困的俄国，被认为是走入绝境。但是中国的状况在瞿秋白看来已经是“阴沉沉，黑黝黝，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所在，我有生以来，没见过一点半点阳光——我直到如今还不知道阳光是什么样的东西——我在这样的地方，视觉本能几乎消失了；那里虽有香甜的食物，轻软的被褥，也只值得昏昏酣睡，醒来黑地里摸索着吃粥罢了。”在他看来，俄国却是能带来希望的所在，他在《饿乡纪程·跋》中写道：“20年来的盲求摸索不知所措，凭空乱舞我的长袖，愈增眩暈。如今幸见心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微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茫无际的前程。”瞿秋白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作者，他将作品取名为《饿乡纪程》正是要舍弃这“乌沉沉”的“黑甜乡里的美食甘寝”，往“饿乡”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来。

王统照评价说，“我同我的朋友，有二年多没有见了。他那个怯弱的身体，竟然大无畏的精神与魄力，居然敢在1920年危险的时期中，向人人视为畏途的苏维埃俄罗斯大踏步走去。而且他那一走，抱了深苦的绝对人世观，却用超越的出世观的烛光引导着走去。”

1920年10月15日晚，也就是瞿秋白离开北京赴俄的前一天晚上，耿济之、瞿菊农、郑振铎、郭绍虞等人(他们都是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来为瞿秋白送行，瞿秋白特意对他们提到了这一典故：“……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

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饿乡纪程》第五章)

瞿秋白这里提到的，其实是《史记·伯夷列传》的典故，殷商时期的小国家孤竹国的国君想要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小儿子叔齐，但是叔齐却认为王位应该国君的长子伯夷继承。伯夷认为自己不应该违背父亲的意愿，应当听从父亲的命令，于是便离开了这个国家。等到国王死后，叔齐仍然觉得自己继位不符合礼法，也离开了国家。周灭商后，伯夷、叔齐耻于吃周朝的粮食，于是在首阳山采薇，最后饿死。瞿秋白在对友人的谈话中使用这一典故，无疑是要强烈表达他那信仰社会主义的热烈而坚决的态度。

历史影响

《饿乡纪程》由郑振铎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1922年9月，商务印书馆)。茅盾当时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后来回忆《饿乡纪程》改名为《新俄国游记》的经过：“这两部书(《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的原稿，是瞿秋白尚未回国时由莫斯科寄来的。当时我觉得这两部书稿的书名是一副对联，可以想见作者的风流潇洒。然而商务印书馆却觉得《饿乡纪程》书名不好，改题为《新俄国游记》，便落了俗套了。”茅盾曾评价道，“对于出身于本世纪初旧社会里经历过大半生涯的知识分子，《饿乡纪程》会给予很大的启发。这也许是我个人感受。但我确是先从《饿乡纪程》认识了秋白同志，而且是在这基础上发生了我对于他的尊敬和钦佩的。”

王统照于同年10月24日写书评介绍《新俄国游记》，并在他编辑的中国大学《晨光》杂志上发表。文章刊于“书报批评”栏，文末署名“剑三”。这篇书评被学界视为“最早认识和正确评价瞿秋白这一名著的好论文”。王统照提出，“我以为由这本游记可以得到两种教训”，其一是“一个悲勇少年的人生观念的自述”，其二是“在游记中最赋有感动的文学兴味的作品”。这两点确实点明了《饿乡纪程》这部作品的意义。

毛泽东高度赞扬瞿秋白：“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1955年，中共中央把瞿秋白的骨灰迁葬到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2006年，在瞿秋白就义的地方福建长汀，竖起了“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建起了“瞿秋白烈士纪念馆”。瞿秋白是一座矗立在中华大地上的永恒丰碑，他兼具政治家、文学家的双重素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党的思想理论，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做出巨大的贡献。

影响。在小说的最后，北京响应上海工人斗争的群众运动完全胜利，人们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演讲，男女主角的情感与思想也达成了完全的一致。

从小说对共产党员斗争活动的描述看，作者显然更富于群众运动中被动动员者的经验，而不是组织者的经验。1932年的一则书评指出：“在布尔什维克开会时，会场上的描写是十二分的不够，这样一个严重的会议，在一页纸上便匆匆的过去，没有把每个人的意见及工作决议……描画出来，只是说很严肃。”这结果是，从落实的行动看，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多少区别，都无非是开会、写文章、募捐——一个非常典范的五四时期的群众运动议程。

当刘希坚和白华展开正面争论时，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间的矛盾，则仅仅聚焦在群体行动中的“纪律”问题上，而无政府主义者的所谓“无纪律”，则主要指开会时的散漫、无序。

因而，也许可以说，尽管胡也频此时已经完全认同于此前的革命文学理论，但他的写作仍然带有某种内部性：即使是天然带有史诗功能的长篇小说，也或多或少被移用于个人思想的调适，而非对现实事件的响应。

此时参与左联中的作家，包括“左联五烈士”中的其余四名在内，往往首先是革命家、党员、革命理论家。他们大多在北伐中参与过实际的斗争，像蒋光慈，甚至是1921年即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受训的“老资格”——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很难称为“文学家”，即使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过发表经历。在这一时期的左联中，胡也频是罕见的开始职业化写作而决绝转向的作家，他的创作生涯显示着20世纪20年代北京文学青年突入革命文学的全部过程。

革命文学论争的参与者或将意识形态斗争视为现实斗争的组成部分，或将革命文学视为对革命胜利方向的开示，但在胡也频这里，文学和革命、内面和行动、个人和历史，仍然显示着某种同步性，他是以一个文学革命者的心理解革命文学的。

两年后，沈从文回顾这段经历时说：“他们觉得文学自由主义与典型主义(按，古典主义)，一则容易使作者精力糟蹋于官能感情的歌颂中，一则容易使读者情绪沉浸于历史倾慕概念上，前者使人放荡，后者使人衰老。他自己得要一点拘束，且明白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翻身，也皆得在某种强健努力中与勇敢牺牲中完成他的职务，故毫不迟疑，他们把这显然落后的工作担提在手，再也不敢不放了。”

在这里，革命文学是一种文学，也正因为它是一种文学，因而它可以革命。它负责处理人的抽象情绪，和近于琐屑的思想，并且相信，只有在这一切都被妥善处理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才可能诞生。



胡也频

的“革命文学”。论战生产了大量理论文章，也贡献了一批苏俄、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译本，这些杂志和书籍成为了此时最受欢迎的读物。

在最开始，胡也频等人对此很可能是不以为然的。在介绍与沈从文共同编辑的文学刊物《红黑》的广告里，他们的文学事业被描述为：“以诚实为归”，“给这巧于立名的各式投机主义标榜时代下另外一点纯文学的补养”。而此时沪上的畅销作家，则被讥讽为“以抄袭贩卖新思想惊吓年青人”“冒充志士或假装热情骗一部分人欢喜”。

不过，按丁玲的描述，这一时期胡也频已经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1928年间开始创作的《到M城去》则被当作他思想上左转的例证。

《到M城去》是胡也频创作的另一个中篇，所取的大体是其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形制，小说主人公素裳是党部要人徐大齐的太太，同时也是带有一切“文学青年”气质的新女性。素裳既不满于徐大齐忙于公务而带来的寂寞，也对政客圈子的生活感到厌倦，在此时，她结识了流亡中的“康敏尼斯特”(共产主义者)施洵白，思想很快左转。结局是洵白被徐大齐杀害了，而素裳则从悲痛中振作起来，独自一人“到莫斯科(M城)去”。

毫无疑问，小说显示出了倾向上的变化，不过仅就文本而言，《到M城去》仍然是一篇典范的恋爱小说。素裳所感到的苦闷与20年代婚恋小说中女性在旧家庭中所感到的苦闷并无显著不同，“康敏尼斯特”和“M城”在小说中毋宁像一种点缀，它担保了恋爱的道德正当性，同时增加了革命浪漫诗克的刺激。

然而胡也频小说中激愤的因素确实在增加，“帝国主义”“资本家”等这一时期的热词，也开始



于武汉的文学刊物《日出》，9月间付排单行本。日益庞大的组织规模和日益高涨的斗争要求引来了济南国民党的注意，胡也频等很快不得不逃离山东。返回上海后，他便和丁玲一道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7月，胡也频已经进入了左联的核心，不久后入党，11月当选左联主席、第一届苏代会代表。这样，在《光明》之后，胡也频的创作数量也随之锐减，按丁玲的回忆，这时他的工作重心已经完全转移到党的事务上去了。

直到1936年左联解散，应当说，左翼文坛的论战文写作，其背后可能有政治安排，但小说写作大体上都是自发的。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胡也频的《光明》与其时党的文艺政策、斗争策略有关，尽管小说的内容显然带有立三路线的影子：主人公刘希坚每看到新的屠杀都奇异地表现出兴奋，因为这意味着群众的斗争情绪要进一步“高涨”了。

尽管此后的评论家大多将这部小说解读为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但总的来看，《光明》更应被视为胡也频济南时期自我说服和相互说服的一次精神的“体操”。

女主角白华是一个热情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共产党员的男主角刘希坚，其主要任务则是借“五卅”期间的事实教育白华，脱离无政府主义的